世纪末的对话

——美苏学者谈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美〕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
〔苏〕斯坦尼斯拉夫·缅什科夫 著
易宝 李谌 郑芮 柳盛 沉晖 译

北京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

内容提要

当华盛顿和莫斯科正在向苦心营造的1987年高峰会谈前进的时候，美国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正在与一位颇受尊重的苏联学者、《世界马克思主义评论》编辑部成员斯坦尼斯拉夫·缅什科夫会谈。他们讨论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与发展，及其现在面临的经济问题；还讨论了人权与核毁灭的威胁等等。这些讨论完全没有官方发言人交换看法时那种不可避免的谨慎和一本正经，而是尖锐地令人惊讶、极富启迪性而又轻松愉快的。更重要的是，这些讨论对人们分析两大社会制度的本质区别和未来发展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目　录

译者的话……1
英国版序言（1988年6月）……4
美国版序言（1988年1月）……7
第一章　社会主义的历史观照……1
第二章　社会主义的今天：经济发展减速的原因（上）……18
第三章　社会主义的今天：经济发展减速的原因（下）……28
第四章　戈尔巴乔夫：改革抑或革命？（上）……45
第五章　戈尔巴乔夫：改革抑或革命？（下）……58
第六章　资本主义的历史回顾……67
第七章　资本主义出了什么差错……78
第八章　“加尔布雷思的改革”……93
第九章　资本主义的未来……108
第十章　社会主义的未来……118
第十一章　美苏之间的经济与政治关系……132
第十二章　超级大国综合症……143
第十三章　和平共存的条件……154
第十四章　合作的条件……174
第十五章　合作的条件：结束语……191

译者的话

这本书是美苏两位颇负盛名的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Galbraith, John Kenneth）和缅什科夫（Menshikov, Stanislav）于1987年夏末在美国佛蒙特州的一次长谈的成果。它详尽讨论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的现状、历史、相互关系及发展趋向。东西方学者，以对话形式就如此广泛而重大的课题直接交锋，还为我们所仅见。无需赘言，这些课题本身就足以引起我们的重视。

有一种时髦的说法：今天的时代，是对话的时代。这句话或许不错。但我们不能天真地相信，对话取代了冷战，乃是由于帝国主义或资产阶级的本性改变了，抑或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对立消失了；毋宁把它看作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两种社会制度和两大思想体系相互斗争的继续。这本对话录就是明证。

加氏是美国新制度经济学派的著名代表。其经济思想往往同传统的资本主义经济理论，以及美国政府现行的经济政策相左。他特别主张国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并称自己的改革为“新社会主义”。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加氏是一个超然于党派、阶级之上的纯粹客观主义的学者。事实上，从他的言论中我们不难发现，即使他在用最激烈的言词批评美国政府抑或鼓吹“加尔布雷思改革”时，仍然在小心翼翼地保护着现代资本主义赖以生存的基石——生产资料私有制。他在

表面公允地谈论所谓两种制度“趋同”时，决不忘记贬低公有制而颂扬私有制。这对我们许多相信两种制度“趋同”的同志来说，倒是一付绝妙的清醒剂。

缅氏是一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他不仅强调苏联改革乃是历史之必然，而且还一再提醒加氏注意，改革的准确含义是完善社会主义，是更充分地利用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而决不是要走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

缅氏对苏联以往实行的计划经济没有采取简单否定的态度。他甚至认为，计划经济正是社会主义优势之一。苏联迄今取得的一切成就，诸如它建立了一个社会公平、正义和没有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社会，它使苏联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就跃居为世界第二号工业强国，这一切都与中央计划组织得当相关。同时，他认为计划经济不是万能的，它也产生许多弊端，而改革正是要解决这些问题。缅氏指出，苏联经济改革既要避免回到老路上去，又要避免走向所谓市场社会主义。因为前者意味着经济停滞现象将持续下去，后者可能会出现失控的通货膨胀。而这些前景都不利于社会主义。他主张改革应达到一种“真正的民主集中制”，即把中央计划中最好的东西和市场机制中最好而害处最少的东西结合起来。

最近，苏联东欧正在发生着戏剧性的急促变化。这变化对于上述主张意味着什么呢？实在难揣测。但我们认为，缅氏的见解有助于理清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路，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就此可以放弃自己的努力——对本国国情进行艰苦细致的研究，是一切欲有所为的理论工作者的基本功。当然，社会主义改革，是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任何一种有价值的设想，都需接受实践的检验和校正。

本书原名《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及其共存》（Capita-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lism,Communism and Coexistence),副标题是:"从苦澀的既往到美好的前瞻"(From the Bitter Past to a Better Prospect)。该书1988年分别在莫斯科与纽约同时面世,因有俄文苏联版及英文美国版;1989年又在伦敦发行了英文英国版。英文两个版本的区别在于,英国版较美国版多了一篇仍由加尔布雷思执笔的"英国版序言"。这个中译本即依据1989年的英文英国版译出。其中,一、二、三章由易宝译;四、五、六章由李谌译;七、十一、十二章由郑芮译;八、九、十章由柳盛译;十三、十四、十五章由沉晖译。沉晖、易宝总校。

1990年3月

英国版序言

国家活动中严厉而起控制作用的意识形态权力日益衰落了，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项确乎不可避免的重要发展。美国的情况就是这样：里根（更确切地说是其支持者们）的强硬权力，已同今天给国家以不可推卸职责的现实发生了尖锐的冲突。这种权力一点儿也不能拯救那苦于陷入困境、又因其庞大而不容倒闭的商业机构；这种权力与所有保守的神学南辕北辙，它依靠和平时期空前庞大的预算赤字去维系整个经济运行；但是它在福利国家无法摆脱的压力方面，还算是勉为其难了。

同样，思想解放的左派也开始承认并肯定市场作用是不可或缺的，从而以实践的方法去评价公有制和国家管理制度。

人们看到，或者说是多少感觉到，英国也出现了同样的趋势，使左派分化为务实的与固守僵化意识形态的两派。如果说撒切尔夫人比里根先生更少一点儿实用主义的话，显然是因为她更多地囿于个人信念，从而可以断言，她在领导与管理方面，都更加举步维艰。

这里谈到的变化（法国也是明显的例证）已跨越西方国家的范围而波及苏联。那里的问题是，对社会主义来说，对个人和集体的激励，以及对市场经济方向，可以做出多少让步而又不牺牲七十年之久的承诺。其次，这个庞大的社会主

义官僚机器怎样才能更为灵敏地运作，以抗衡它自身固有的绝对权力。

我同缅什科夫，在佛蒙特州我的乡间别墅里讨论的正是当前世界的这种趋势。我们打算，也的确做到了，把这次讨论的成果在美国和苏联大约同时公之于众。每天下午我们都商定好第二天要谈的内容。由于事前多少有些准备，所以第二天上午我们便展开富有成果的讨论。我们之间的交谈，大多时候只有一个记录员在场；有一次公开讨论，听众都是从附近别的宁静乡村来的人，显然他们的兴趣很高。

我们之间对话的目的，既非相互指责，也不想强求共识或争辩输赢。尽管这些讨论要留待读者去品评，但我们的确力图进行尽可能既有价值又有意义的交流。当然，如遇有轻松幽默的话题，我们也决不错过。讨论结束之后，我们使其全部内容保持原样，不过必需做些剪辑，使谈话形式变成读者可以接受的英文或俄文文体。

我同缅什科夫是多年的朋友了。我第一次认识他的时候，他是莫斯科大学一位专门研究西方经济的教授。以后，他在纽约任联合国高级官员，后来又在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国际部担任要职。最近，他在布拉格的《世界马克思主义评论》编辑部工作。他能够也一向希望清楚地表达他对苏联经济与政治问题的看法，这在本书中是显而易见的。而且，也许我可以说，他的这种才能与心愿肯定要早于“公开性”。这项计划有他的参与，使我尤感愉快，相信读者也会有同感。

在美国，以往的许多年间，反共已成为我们文化的一部分。我在本书的“美国版序言”中曾谈到，在我国流行着这么一种看法：所有苏联的发言人都是其上司的工具，充其量

也不过是喋喋不休的骗子。那些与他们争论的人（很可能）受骗上当，或（显示出）他们不可救药的天真。我还婉转地补充说：我可以宽容这种说法“终身信仰值得献身，也应受到捍卫。”我愿相信，有着更为悠久、更富于鉴别传统的英国读者，几乎没有什么宗教上的动机，他们会同意我的这项重要建议的：倾听从丘吉尔所谓铁幕那边传过来的声音并期望这幅铁幕继续崩坏。本着这种精神，我非常愉快地将这部小书献给英国的读者。

加尔布雷思

1988年6月

美国版序言

二十四年前，我去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参加一个文化交流会。一天，我和我尊敬而知名的同事：大卫·洛克菲勒、诺顿·西蒙、诺尔曼·康森斯和巴克明斯特·富勒到美国使馆住地斯帕骚大厦赴午宴，同桌的正好是我的俄国同行、博学强记的学者斯坦尼斯拉夫·缅什科夫。他向我发表了一通对赫鲁晓夫时代政策的尖刻评论，当时赫鲁晓夫的地位也许正处在所谓黄昏时期。他对美国经济问题几乎同样熟悉。据说，他在莫斯科大学讲授美国经济课程。

从那以后，我同缅什科夫的交往就没有间断过。在莫斯科、纽约（他作为联合国高级官员在那里呆了六年）、剑桥和佛蒙特，我们又见过几次面。当一家苏联出版社索要我的两部著作《我的自传》和《新工业国家》时，我多少有点儿惊讶。后来才知道，是缅什科夫赞助了这两部书在俄国出版，并充当保证人。

最近一次会面是在1987年夏末，我们在美国佛蒙特进行了十天左右的长谈。每天下午，我们一起商定第二天上午要讨论的题目；每天上午，我们就其中一个题目进行讨论。这些题目后来就变成了本书当中的一章或几章。我们打算把我们探讨的成果在苏美两国同时发表。今天，这个想法实现了。我们更深一层的目的是要表明：一位美国人和一位苏联人，尽管所持观点不同，但是可以心平气和地坐到一起的。我们希

望，对我们之间不同的及共同的问题，以及我们在这个越来越小、不得不互相依赖的世界上和平共存的条件及必要性等问题，进行富有成果的讨论。我们也力求以不是过于严肃的态度来讨论这些重大而严肃的问题，某种超脱甚至轻松诙谐的态度，并不妨碍表达较为深邃的思想。

读者不难发现，书中没提到某些与我们探讨的问题有关的事件。我们的会谈是在去年8月进行的，而印刷发行，尤其是优质的印刷发行，却是一项非常费神耗时的工程。当一本书最终可以摆在书店的柜架上以前，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我们交谈的时候，10月19日的股灾尚未发生，戈尔巴乔夫访问华盛顿并签署中导条约，以及几次官方与非官方会谈（其中有一次我还有幸参加）等等都还没有发生。这些事件假如在我们交谈以前发生，我们无疑会去讨论的。但如我以前讲过的，一本书并非象报纸或电视节目那样，只对昨天的事件进行评论。我相信，我们选择讨论的题目、事件虽已成为历史，但其意义却还长存。

还有一些更小的但却值得说几句的问题。过去几十年当中，反共已深入我们的文化而成为一个组成部分。反共有其本身的既得利益，在学术界或其他文化领域也有不少的既得利益。生活中流行着这样一种假说：所有苏联的发言人都是其上级的喉舌，充其量也不过是喋喋不休的骗子。那些与他们争论的人不是上当受骗，就是不可救药的幼稚无知。

我从直觉上宽容这样一种说法，即我常说的：终身信仰值得献身，也应受到捍卫。有些人比较热衷于在经济、军事和政府方面与苏联继续保持紧张关系。他们顽固地随时准备批评并谴责对方。但是，我们大家多少也是我们既往的信念、我们自己的社会以及我们本身利益的俘虏。因此，我抱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有宽容的观点。在本书中，我若不是恰当地也算是充分地表达了我个人的信念，即和平讨论乃是我们时代的本质所在。和平共存是广泛的要求。我相信在讨论当中优势是不会只是一面倒的，这一点儿也不使人感到惊奇。

然而，在对话中得分决非我们的目标，无论是我，还是我的苏联合作者，都没有这个目的。我们不把这场交谈视为决一雌雄的争论，勿宁说是看作为我们同样希望分享的更大胜利做点儿贡献。这就是我们共同的祈愿。

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

1988年1月

第一章

社会主义的历史观照

加尔布雷思（以下简称加）：非常高兴又在美国和佛蒙特见到您。我想，作为主人，我可否有首先提问的特权？美苏关系以及我们两国内部状况诚然对世界有影响，可为什么现在讨论这些问题是一个有趣而又有益的时机呢？

缅什科夫（以下简称缅）：我以为，我们现正处在文明史的一个转折点上。美国和苏联代表着两种不同而又相互竞争的社会制度。这两大强国之间的战争，会使文明，从而使这两种社会制度毁于一旦。有些人只是最近才看到这个最明显也是最突出的事实。而许多人、也许甚至是多数人，可能还没有真正地认识到这个事实。这有多种原因。在这个世界上，一些人饥饿难捱。他们想的是吃饭，以及如何勉强糊口地生存下去。另一些人则卷入当地的内战或争取民族主权的战争当中。他们想的是怎样取得国家主权。还有些人的生活环境比较安稳而讲求实际。他们所想的主要是怎样提高物质和社会生活水平，在他们看来，核威胁似乎还是渺茫无期的事情。

加：我很赞成这么讲，但想补充一句，也是我以前常讲的：即使对那些最虔诚的理论家来说，在核战争的废墟上

面，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者之间的区别也会变得微不足道了。

但是当前，在苏联，也许还有在美国所发生的变化，不正是呼唤我们在这特殊时机的彼此对话吗？

缅：是的，正是这样。但我想把我的观点讲完：尽管大多数人可能还没有认识到文明或许受到了核战毁灭的威胁，但这的确是事实。因此我们确实到了重新认识的时候。我们必须重新考察这两种社会制度的关系，以及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我们必须认识到，无论是核战争，还是非核战争，这两种制度都会存在下去，即使我们两国之间避免了直接的冲突，这两种制度仍然存在。既然这两种社会制度不会终止其存在，那么我们之间的各种问题就会依然如故。

加：我想强调一下，您说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会继续存在下去，这我同意。但是说我们已经到了去想象什么时候共产主义会埃管美国及西方国家的时代，却是错误的。只有发了疯的人才会真的这样去想象。同样，想象苏联今天发生怎样的变化才会变成资本主义国家，也是愚蠢至极。

缅：要解答这个问题，应深入讨论这两种制度目前的内部情况。但我现在要说的是：我们两国都应当学会和平共处。我们必须这样做，不管我们是否认为自己的制度比另一国的制度优越，还是相信自己的制度终将取胜。

加：我同意。毫无疑问，我们还应当允许这种使我们各自感到骄傲的优越感。

但请告诉我，难道不是最近的变化促成了我们这次有益对话的时机吗？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戈尔巴乔夫先生进行的改革。您以为这些变化是非常重要的吗？

缅：我认为这些变化实际上是革命。我国许多人在谈论

"第二次革命",就象谈论七十年前发生的十月革命一样。对这个特殊论点，我们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但目前遍及苏联各地的变化，确实具有革命的性质，并且意义深远。

加：我们的读者大概很愿意听您多讲讲这方面的情况。至于美国，我认为目前还没有特别具有决定意义的变化。但我已感觉到，也许我们正在接近一种新的视点，即解决我们自己的制度——资本主义没有解决的问题的一种新的探索。我期望有一种新的视点，可以解决我国大城市中的失业问题，以及少数民族，特别是青年人的失业问题。农业危机和陈旧的大规模生产的危机，使得工业缺乏活力。今天我们看到它已经变得僵硬不化了；我们这里无家可归及住房破旧的人太多了。我想我们已接近严肃地正视这些问题及类似问题。因此，也许可以这样说，当苏联宣布它的革命时，在这转折点上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革命。

缪：是的。无论人们对自己的制度怎样去看，也无论是否普遍承认必须进行的各种变革，事实都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今天都处在严肃地重新认识的时期。这种重新认识是危机形势或前危机形势的结果。在两种社会，不仅在社会主义社会，而且在资本主义社会，都有这种情况。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许多方面，既有成功之处，也有不成功的地方。但是人们认识到了核战争的可能性及世界上其他重要的社会问题，譬如富国与穷国之间的差距、超级大国与小国之间困难重重的关系等等，今天已懂得了：我们必须重新认识；危机存在着，我们确实应当变革。

加：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但还有某些阴影笼罩在我们之间的对话上面。我记得在我以前对您的国家历次访问时，就象您也会想起过去您对我国许多访问那样，我们彼此

都曾向对方宣传过这样的观点："我们是一切美德之乡，而你们则是万恶之薮"。这就不可能有非常有益的沟通了。今天我想说，我们双方都已达到各自发展进程中多少更为成熟的阶段，可以坦诚地看待我们共同面临的问题，譬如我们的庞大的工业化官僚机构及其低效无能之类，同时可以看看我们双方还必须解决多少问题。

缅：我希望，我们苏美两国和两种社会制度以后可以协同合作。无论我们有多大分歧，也不管谁是万恶之薮、谁是美德之乡，我们都应当在涉及双方的共同问题上携手合作。这种合作，不仅仅限于怎样去避免核战争。比如，世界性的吸毒问题……

加：还有酒精中毒的问题。

缅：还有环境、能源、人口爆炸等等问题。

加：还有我刚才讲的工业化官僚制度的问题，以及难以吸引人们从事卑微职业的问题。我们双方都承认，世上所有的人都力图不去做体力劳动，例如您和我现在就在逃避这种劳动。

但是，我想搞清一个问题，以利于进一步的讨论：当人们谈到苏联或苏维埃制度时，什么情况下应当用"社会主义"这个词，什么时候应当用"共产主义"这个词呢？人们总在说，共产主义是最终目标，它还不具备实现的条件，所以在谈到苏联的经济时，我们应当称之为社会主义，对吗？

缅：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中间的一个过渡阶段；共产主义是未来的理想社会，其显著特征是产品极大丰富并实行自由分配；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产品的分配则是根据每个社会成员所付出的劳动。

加：在共产主义条件下，国家已经消亡。我想您不会认为在苏联国家已经消亡了吧？

缅：我不这样认为。但是，即使实现了共产主义，国家也不可能彻底消亡，这取决于您怎样理解国家的职能。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是否必须保留中央计划的职能，这个问题我们稍后再谈。

加：您是说我记忆马克思的话有点儿过于拘泥文字了吧？

缅：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马克思所说的国家消亡，也许是指国家某些职能的消亡，例如警察机关的消亡；如果做到彻底裁军的话，还有军备机关的消亡。但是就经济管理来说，国家可能还会有某些职能的。

加：我认为您这是在为自己的目的修正马克思的观点，当然这是完全允许的。在这个问题上，我必须向一位马克思主义者让步。

缅：有时我们不得不进行修正。但严格地说，当我们谈到重新认识时，丝毫无损于马克思主义。我们总应当根据我们的实际生活来重新认识各种理论。

加：我完全同意。那种认为我们要固守十八、十九世纪观念的看法，是思维敏锐的人所不能接受的。

缅：还有，任何有生命力的制度不断地经历变革，这是正常的。我们必须用新的组织形式去进行实验，才能使之充满新的生命力。

加：我记得马克思说过，社会是一个永恒变化的过程。

缅：完全正确。

加：让我们记住这句话，来谈谈现代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自从俄国革命和苏联进入社会主义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